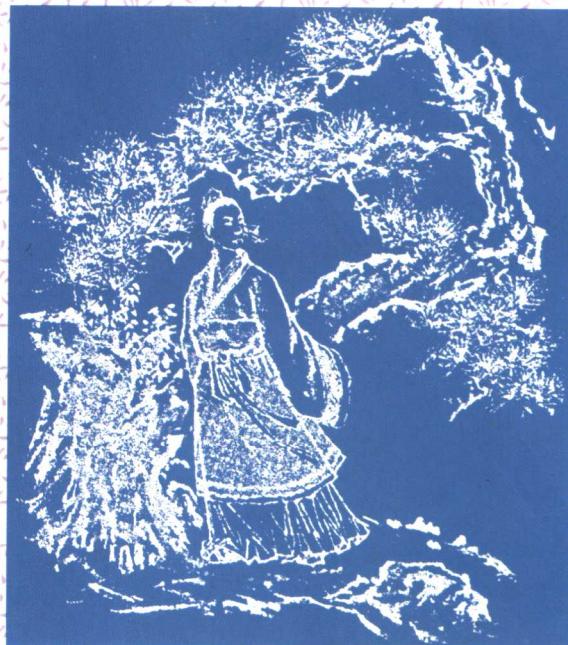




第二屆當代新儒學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之二

儒學與當今世界

楊祖漢／主編 牟宗三／等著



文津出版社印行

第二屆當代新儒學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之二

儒學與當今世界

楊祖漢／主編 卦宗三／等著

文津出版社印行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儒學與當今世界 / 牟宗三等著；楊祖漢主編
-- 初版。-- 臺北市：文津，民83
面；公分。-- (鵝湖學術叢刊；24)(第
二屆當代新儒學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2)
ISBN 957-668-263-0(精裝)。-- ISBN 957-
668-264-9(平裝)

1. 儒家 - 論文, 講詞等

121.207

83011359

(24) 刊叢術學湖鵝

儒學與當今世界

主編者：楊祖
著作者：牟宗三
發行者：邱敬
出版社：文津出版社

臺北市建國南路二段二九四巷一號

郵政劃撥：○○一六〇八四一〇號

電話：三六三五〇〇八・三六三六四六四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五八二〇號

定價：
精裝：平裝
新台幣三一五〇元
新台幣二五〇元

中華民國八十三年十二月初版

ISBN 957-668-263-0(精) 957-668-264-9(平)

作 者 簡 介

- 牟宗三 香港新亞研究所教授
盧雪崑 香港新亞研究所副教授
蔡仁厚 東海大學哲學研究所教授
方穎嫻 香港大學中文系講師
李明輝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副研究員
馮耀明 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講師
周群振 台南師範學院教授
羅義俊 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楊祖漢 中國文化大學哲學系教授
鄭志明 淡江大學中文系教授
霍韜晦 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高級講師
蘇新鑒 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曾昭旭 中央大學中文研究所教授
龔鵬程 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教授
牟鍾鑒 北京中央民族學院哲學系教授

《儒學與當今世界》

導　　言

楊　祖　漢

本書所收的十四篇文章，是第二屆「當代新儒學國際學術會議」（鵝湖月刊社及東方人文學術研究基金會主辦，一九九二年十二月）的部分論文，內容大抵有關於儒學在面對當前的世界應有的理論之開展，故取名為「儒學與當今世界」。

牟宗三先生的〈中國文化發展中的大綜和與中西傳統的融會〉原是在會前發表在聯合報副刊的訪問稿，內容和牟先生在會議開幕時所作的主題演講大致相同，而較為詳盡，故將此稿取代主題演講而收入本書。此文從沈有鼎先生在一九三七年發表的文章談起（按沈氏之文為〈中國哲學今後的開展〉，收入《沈有鼎文集》），指出今後的中國文化，必會是一大綜和。所謂大綜和，是由傳統儒學的內聖之學，開出科學與民主。這大綜和，若從哲學理論上講，則名曰「徹底的唯心論」。此所謂之唯心論，與一般所理解者不同，讀者幸留意焉。牟先生這篇訪問稿，指出了中國文化將來應有的發展方向，很清晰地表達出牟先生多年來對這問題的思考成果。

關於傳統儒學，或重德的中國文化生命，如何開出科學與民主一問題，牟先生有「良知的自我坎陷」之說，這一說法，是對

德性心如何能轉出認知心的哲學理論的說明。關於牟先生此說，近年有許多討論與批評。蔡仁厚先生的〈所謂「開出說」與「坎陷說」——有關「民主、科學」出現的內因與外緣〉，便是對這些批評而作出的回應。蔡先生精熟的思理與中肯有力的文字，很能表達出牟先生理論的原義。此外，蔡先生在文章的最後，從好幾方面說明儒學在當今的社會仍有其生命力，而可與時俱進，是很值得關心這問題的人參考的。方穎嫻教授〈「良知之自我坎陷」與中國現代化〉一文，雖然也是討論「自我坎陷」說，但她是從古代中國文化的發展，及西方民主觀念的發生過程，來闡述民主觀念與知性及道德的關係，解釋中國所以未能發展出民主政治之故。此是方女士此文的特色。

關於新儒學的天道觀，「超越而內在」是一個很重要的說法。李明輝及馮耀明兩位，都針對這一說法作出分析。本來，超越（Transcendent）和內在（Immanent）是相反字，如是，何以能說既超越而又內在呢？一些中外學者對此說便有所不解。馮耀明先生的〈當代新儒家的「超越內在」說〉便是對此說提出質疑的，他對熊十力及牟宗三兩位先生的說法都提出批評，認為有不易克服的理論困難。李明輝先生的〈儒家思想中的內在性與超越性〉對既超越而又內在之義分析得很清楚，是很見李先生治學的功力的。他又進一步指出，新儒家所說的超越而內在之超越，是內在的超越性，而基督教的超越而外在的超越，是外在的超越性。這亦是一很明白而又可解消誤會的區分。當然，這是一個十分精微的問題，是可以繼續討論的。我個人認為，以內在的超越與外在的超越來區分儒學與基督教，固很可以表意，但似亦未能盡。儒家所說的天道，是形而上之實有，並非經驗的事物，所以是超越的，而天道也是人的本性，是可以通過工夫以體現出來的，故亦

是內在的。而基督教所說的上帝，是世界的創造者，創造者不同於所造之物，故是超越而外在者。但雖如此，超越而內在，是針對超越而外在而說的，儒家所說的天道，是一切存在所以能存在的根據，是「創造性自己」，等於基督教所說的上帝之地位，言超越而內在，即表示反對超越而外在之說，認為作為一切存在的根據者，雖是超越，但並非離人而外在。二說是互相排斥，而不能同真的，若超越而可區分為內在的超越與外在的超越，則似可理解為兩套可以同真，不必相諍的說法。若是如此，便顯不出當代新儒家提出超越而內在之說的用心。

名史學家余英時先生在一九九一年發表〈錢穆與新儒家〉長文，對錢穆先生當年與熊十力、唐君毅、牟宗三等先生的交往、論學的情形有所討論，認為錢先生為學素反對門戶之見，不肯居於新儒家之列。余文又對新儒家的思想理論有所批評。余先生此文，產生了相當的影響。在本書所收的文章中，便有三篇涉及余先生文所提出的問題。周群振先生〈新儒學在於現代之處常與應變〉，雖未指名，亦不是只討論余文，但對余文的主要論點，都已提出扼要的回應。羅義俊先生的〈近十餘年當代新儒學的研究與所謂門戶問題〉，除對近年新儒學的發展情況及對當前的思想之影響，有明白的敘述外，對余先生文中所提的門戶問題，提出評論，認為新儒家並非有門戶之偏見。對當年錢穆先生沒有在「中國文化宣言」上簽名參加之事，亦作出了同情的解釋。拙作〈論余英時對新儒家的批評〉，則就余文所提的各比較重要的論點，都加以討論及回應。

鄭志明先生的〈當代儒學的宗教對談〉亦是回應對新儒家的批評而發的。傅偉勳先生曾認為新儒家們以「儒家不是宗教」是可商榷的，即他認為儒學是深具宗教性的。其實唐、牟諸先生對

儒學的宗教意識、超越意識，是多有闡發的，鄭文對此有所敘述，又對新儒家乃至作者自己所曾從事的與其他宗教徒溝通、對談的努力有所說明，並認為這是儒學應有的參與社會的活動。

霍韜晦先生的〈論民主政治平面化的危機——一個儒家的現代回應〉及蘇新鑒先生的〈儒家崇德與現代尚法思想的落實〉都從儒家思想對現代政治應有的作用來討論。霍文從民主政治的限制及其可能產生的流弊，提出儒家的回應，認為民主政治當然是必需的，但它所造成的平面化、量化，及人的精神墮落等弊病，亦是很明顯的。而儒家的內聖之學，可以匡正這些弊病，而使人民的素養有質的提昇。蘇文亦言儒學成德之教對現代社會有積極的功效。認為在現今普遍崇尚法治之時代，亦須正視由內心自發的道德。崇德與尚法必須並重，二者互補，缺一不可。

曾昭旭先生的〈儒家倫理的再詮釋〉則是從管理的角度，對儒學義理作出闡釋與反省，認為傳統的「法結構」與「情結構」須以仁來融通，是饒有新意的。龔鵬程先生的〈我看「儒學經世」〉一文，則認為儒者常求有用於世，但對世務之了解恆十分浮淺，或只知援引經義而為世間立法，若果真用其言，則一定產生極大的弊病。他舉顏元的言論為例，加以分析，以證成此說。

牟鍾鑒先生的〈新儒家的歷史貢獻與理論難題〉，對大陸學界研究當代新儒學的情況有所描述，對新儒學的價值，亦有相應的理解。牟文之後半部，提出幾個儒學在現代世界必須面對的難題，相當有建設性，是值得思索儒學如何才能在現代世界恢復其活力的人細讀的。從牟文及前述羅義俊先生的論文，很可以見到大陸學者對新儒家的思想，亦不乏心態相應，且有相當深刻的了解者，這應便是唐君毅先生晚年所深切企望的「回流反哺」的現象了。

《儒學與當今世界》

目 次

- | | | |
|-----|-----|--------------------------------------|
| 1 | 楊祖漢 | 《儒學與當今世界》導言 |
| 1 | 牟宗三 | 中國文化發展中的大綜和與中西傳統的融會 |
| 15 | 蔡仁厚 | 所謂「開出說」與「坎陷說」
——有關「民主、科學」出現的內因與外緣 |
| 29 | 方穎嫻 | 「良知之自我坎陷」與中國現代化 |
| 55 | 李明輝 | 儒家思想中的內在性與超越性 |
| 75 | 馮耀明 | 當代新儒家的「超越內在」說 |
| 95 | 周群振 | 新儒學在於現代之處常與應變 |
| 113 | 羅義俊 | 近十餘年當代新儒學的研究與所謂門戶問題 |
| 147 | 楊祖漢 | 論余英時對新儒家的批評 |
| 179 | 鄭志明 | 當代儒學的宗教對談 |

- | | | |
|-----|-----|----------------------------------|
| 201 | 霍韜晦 | 論民主政治平面化的危機
——一個儒學的現代回應 |
| 215 | 蘇新鋈 | 儒家崇德與現代尚法思想的落實 |
| 239 | 曾昭旭 | 儒家倫理的再詮釋
——從管理的角度論三角形結構與橢圓形結構 |
| 253 | 龔鵬程 | 我看「儒學經世」 |
| 273 | 牟鍾鑒 | 新儒家的歷史貢獻與理論難題 |

中國文化發展中的大綜和與 中西傳統的融會

牟宗三

盧雪崑 ■ 訪問記錄

前言

受「鵝湖」朋友所託，在「當代新儒學國際學術會議」前夕訪問老師。因想到老師平常說：「哲學家要為社會指示一個方向。」因此，我想問以下三問題：

- (一)想請老師談談中國文化發展的方向。
- (二)最近亞洲電視台給老師做了一個專訪。電視訪問中，老師說：儒家思想是「人性之常、自然之常」。老師講課的時候也會說：「儒家哲學是實踐的智慧學，它是個人生活的指導原則，也是社會實踐的指導原則。」那麼，我想請老師談談新儒家在現時代中應該有怎樣一個擔當。
- (三)最後一個問題，就是現在大陸上要求改革開放，儒家與現代化的關係成了熱門話題。新儒家如何回應這種問題？

牟先生：你提出這三個問題，我不必逐個答覆。總起來是一個問題。兩年前那次新儒學會議我有一個講辭，那篇講辭是一個反省之語，前一輩老先生啟發性有餘，客觀的了解不足，所以不能適應時代之所需。這次換一個話題，就你剛才所提的問題總起來講兩點。

一、未來中國的文化是一個大綜和時期

新儒家的興起有歷史運會的必然性，因此，它在歷史運會中也有它在這個時代中的使命。今天我就告訴你兩點。

「七·七」事變那一年，中國「哲學評論」會議在南京召開，其中有沈有鼎先生的一篇文章。念哲學的人當中，沈有鼎是最聰明的一個。他有邏輯的天才，也有哲學的天才。但是他的堅持性、執著性不夠。「中庸」說：「擇善而固執之」，不管你有哪一方面的天才，假定你有邏輯天才，你固執下去，你可以成邏輯專家，有貢獻；假定你有哲學天才，你固執下去，你對中西哲學的最高境界也可以有貢獻。可惜他就是持續力、堅持力不夠，但他有些識見，洞見力很強。他也不是真正的對中國的歷史文化有詳細的深入內部的了解，但他籠統的有一個看法。當時他的文章有一個說法：中國文化在先秦儒家是孔孟，後來是宋明理學家。將來這個時代，中國歷史的運會是一個大綜和時期。這個大綜和時期一定是繼承宋明儒，從宋明儒偏枯的一面再往前推進一步，適應現時代。

我們平常說，宋明儒學特別偏重於內聖。到明朝末年，十六、七世紀，王船山、黃梨洲、顧亭林出來的時候，他們已經知道中國歷史的運會要開一個新方向，不能再維持宋明儒那六百年的方向，那個方向太重視內聖。所以，黃梨洲、王船山、顧亭林他們就主張從內聖開外王，就是向外開，因此，才重視經世致用之學。從內聖開外王的方向為什麼打斷了，開不出來了呢？就是滿清的關係。滿清一到中國來，就是一個異族統治中國，把黃梨洲、王船山從內聖開外王的方向堵住了。大家都知道，黃梨洲、王

船山、顧亭林是明朝三大遺老。王船山在衡山猺洞著書，他的書根本不得印行，後來曾國藩才替他印出來。黃梨洲的「明夷待訪錄」是多麼開明，但滿清一來都給堵住了，顧亭林一方倡言亡國亡天下之不同，一方力主經世致用之學。但因他根本反對滿清，所以他的學術思想、文化精神，持續不下去。

十七、十八、十九世紀三百年是滿清大帝國，滿清大帝國對中國文化一點好處也沒有，這就是近代中國的歷史。中國原有的歷史文化怎麼能出來共產黨呢？就是五四運動的淺薄的理智主義。五四運動為什麼那麼淺薄呢？這就是滿清乾嘉年間考據學問的遺害，這個學風一步一步影響下來，所以，中國知識分子喪失思考力，喪失發展思想的能力。滿清三百年的統治，知識分子喪失思考力，那個歷史運會錯失了，那個從內聖開外王的方向、要求堵回去了。假定沒有滿清三百年統治，中華民族發展的自然方向跟西方差不多。清朝是十七、十八、十九世紀這三百年，而西方正是這三百年蒸蒸日上地向現代化走。這些向外開的思想在黃梨洲的「明夷待訪錄」中都有了，都看出來了。中華民族這個文化生命是自然地要往外開，就是讓滿清人堵回去了。

沈有鼎是念邏輯的，但他喜歡談大問題、說大話，他有這種聰明。他有哲學天才，我寫易經那部書，旁的人不能欣賞，就是他能欣賞。他說我那部書是「化腐朽為神奇」。

我們這個朋友有洞見，他當時就說：中華民族文化生命本來就是要求向外開，讓滿清堵回去了，現在我們碰下中日戰爭這個大時代，但將來歷史總還是要往前進，日本不能亡中國的。所以他看到：在歷史的運會上，將來的中國一定是一個大綜和，這個大綜和就是繼承宋明儒內聖之教往外開。當時沈有鼎有此一說，只是幾句大話而已，沒有人理會他。我們也沒有這個見識，因

爲我們對以前的內聖之學不清楚，「七·七」事變那年我才二十七歲，所以自己不清楚。當時我看了沈有鼎那篇文章，覺得很有道理。但他不能「擇善而固執之」，所以也不能把他提出的那個大綜和的脈絡、內部的結構一步一步講出來。沈有鼎講不出來，我當時也一樣講不出來，但我那時候就有這個識見，我說這篇文章很有道理。以後就是抗戰，上海一撤退，我們就逃難。八年抗戰和熊先生在一起，對於中國文化的核心與內蘊重新磨鍊，仔細薰陶。先不要講往外開，先把中國文化最核心的內蘊好好整理，客觀了解，了解透徹了，自然就往外開了。沈有鼎說中國將來是一個大綜和，當時大家都不能夠很清楚地確定地了解這句話。大綜和不是一句大話，說大話是沒有用的。綜和什麼東西呢？如何綜和呢？當時我們都不清楚。中國文化有一個文化生命，有一個本，這是不錯的，但本是本，要綜和些什麼東西呢？這個很難解答。

二、將來支配中國命運的是一徹底的唯心論

今年十月間，濟南山東大學舉辦新儒家會議，傅成綸參加了。傅成綸是抗戰時期我在成都教書時的一個老學生。會議結束之後，他寫了一封長信給我，告訴我那個會議的情況。會議裡面講新儒家，這個以前誰敢講？以前批林批孔呀！山東大學一位教授談到新儒家三點貢獻：第一點，繼承中國傳統文化的方向。這個傳統在大陸上已經成「死螃蟹」了，紮死了。第二點，權衡其得失，如何現代化。第三點，如何建立一個中西文化結合的模型。這位教授也談到新儒家的缺點，就是經世致用的比例不夠。他們

問的就是這個問題：你新儒家究竟與現代化有什麼關係呢？我不是政治家呀，我上哪裡去經世致用呢？科學不是要魔術，不是我說要科學，科學就來了。這種問題是大家的問題、民族的問題、歷史運會的問題。我們能從哲學上疏通其通路，這就是新儒家的貢獻了。

傅成綸的長信最後提到沈有鼎，沈有鼎這個人很怪，他心中始終存有那一個看法，但他平常不注意這一套，他不念政治哲學，不念歷史哲學，也不講文化問題。傅成綸信中提到：沈有鼎當年在昆明寫了一篇文章，文章說：「將來支配中國命運的不是延安的徹底的唯物論，就是此間的徹底的唯心論」。「此間」是指廣義的自由世界，照中國講就是當時國民黨統治的世界。沈有鼎說了這麼兩句怪話，前一句話大家都知道了，當時左傾的意識風靡天下，一般人都往延安跑，左傾的社會風氣整個的往一邊倒，社會輿論都掏空了。沈有鼎說的「徹底的唯物論」就是共產黨那一套，以後它果然成功了，但也不過如此。蘇聯、東歐都垮掉了，中共能夠維持多久很難講，但它早晚非和平演變不可。大陸總要變、總要改革開放，沒有回頭路可走。中共主宰大陸四十多年，主宰的結果是「徹底的唯物論」的徹底失敗，沒有人相信馬克思。

「徹底的唯物論」過去了，那麼，「不是延安的徹底唯物論，就是此間徹底的唯心論」。什麼叫做「徹底的唯心論」？這個「徹底的唯心論」由誰來表現？沈有鼎的話有一種哲學洞見，這種話只有哲學家可以說出來。「就是此間的徹底的唯心論」這句話跟他在南京講「大綜和」的文章是相呼應的。這個大綜和說得更哲學化一點，就是徹底的唯心論，徹底的唯心論就是一個大綜和。沈有鼎當年說這句話，現在看來應驗了。風氣又轉過來了。

再沒有人相信徹底的唯物論，沒有人相信馬克思了。傅成綸給我的那封信中談到，山東大學那個新儒學會議結束的時候，有一個女副教授提出來：為什麼會場上沒有人提馬列主義？這個在以前是不成的。可見風氣變了。沒有人提馬列主義，馬列主義給冷落了。年齡大一點的人要敷衍共產黨，拉孔夫子跟馬克思合作。沒有人相信馬列，他們就拉孔夫子，這樣一來，孔夫子又倒楣了。你把孔夫子拉去，孔夫子就是徹底唯心主義的一個象徵。

這個時候說的徹底唯心論，不是哲學上一個空洞的名詞，要徹底好好了解。沈有鼎說徹底唯心論的那篇文章我沒有看到，他怎樣個說法，如何論證，我也不清楚。他寫這篇文章還是抗戰時期，我們還在成都，當時也沒有人注意他。可見他寫的那篇文章不是很大，或許只是幾句話。所以我說沈有鼎這個人順著自己的洞見「擇善而固執之」的堅持力量不夠，學力也不夠。「徹底的唯心論」只是一句話，這個要充實內部，它是一個大系統、一個大的綜和。這個大綜和要一步一步撐起來、建構起來，加以展開。這個工作很難，要下工夫。

沈有鼎說「不是延安的徹底的唯物論，就是此間的徹底的唯心論」。延安的徹底的唯物論表現過了，表現的結果是徹底失敗。將來中華民族的方向、歷史運會的方向必然是徹底的唯心論，必然是一個大綜和。這就是說，新儒家的興起有歷史運會上的必然性，你要擔當這個必然性。中華民族要擔當這個必然性。

念茲在茲，默默耕耘

我這個人是個默默耕耘的人，我一生沒有做官，我不參加國民黨，當然我更不參加共產黨。我不是這個時代的參與者，我是這個時代的一個旁觀者。所以我這個生命，你要注意這一句話。

「旁觀者」就是你自己鬧中取靜，你自己默默地在耕耘。「旁觀」就是這個意思。默默耕耘中，我活了八十多歲。要有相當的時間才成呀，沒有時間，任何聰明都沒有用。

我這個人只能教書，既不能幹政治，也不能做生意，抗戰時期也沒有汗馬功勞。所以，對於這個時代，你不是一個參與者。你只能默默地耕耘，就是自己讀書，教一輩子書。同時念茲在茲，思考一個問題。思考什麼問題呢？就是中國文化的歷史發展的方向，如何從內聖開外王。如何從內聖開外王，就是沈有鼎所說的那個大綜和。

這個大綜和不是一句空話，假定你從中國文化生命的命脈一步一步的滲透悟人，先了解了自己才成。籠統地說「文化生命」，只是一句話，沒有用的。籠統地說「先秦儒家」，也只是一句話，也沒有用的。你要一步一步進去，要把握住中華民族的文化生命的命脈。這要費時間，要下苦功，不是一包空話就完了。「孔孟之教」一句話沒有用，你要徹底了解什麼是孔子的智慧，什麼是孟子的智慧。要一步一步契入，這就是荀子說的「眞積力久則入」（「勸學篇」）。對於自己的文化生命的命脈要能契入，一步一步地悟入，你才能夠知道這一個生命的命脈為什麼能開出一個大的綜和系統。

一步一步契入文化生命的命脈。先講先秦，我寫了幾部書，一部是「歷史哲學」，一部是「政道與治道」，從夏商周三代一直演變到春秋戰國，這樣才能夠把握先秦時期孔孟的生命智慧，了解在歷史運會中、歷史發展中孔孟生命的格範。再往前發展，經過漢朝的經學期，到魏晉時期復興道家，我又寫了「才性與玄理」。寫「歷史哲學」、「政道與治道」，都是了解中國的原始文化生命，從夏商周三代開始如何發展到春秋戰國，以後又如何